

# 民國時期(1912—1937年)中小學國恥教育初探

張逸紅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國恥，指“國家所蒙受的恥辱，多指外國的侵略或壓迫”<sup>[1]</sup>。國恥教育，概要地說，就是為了激發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對全體國民施以有關國恥之事實的教育。在近代中國，其實施的途徑主要有組織國恥社團、撰寫出版國恥書刊、召開集會、發表演說，以及開展學校國恥教育等。其中組織最嚴密、影響最深遠的當數學校國恥教育。以往對民國時期學校教育的研究多集中於學制、課程、教科書和教學方法，對於具體教育教學內容的研究較為薄弱，尤其是極少關注其時的國恥教育問題。本文對民國時期(1912—1937年)中小學國恥教育作一初步探討，以期引起學界對該教育現象的足夠重視。

## 一、學校國恥教育的興起與發展

學校國恥教育並非一門單獨的課程，也非某一門學科的補充性內容，而是以國恥之事實為主要內容，貫穿於學校管理、訓育等各種活動，以及公民、國文、歷史、地理、圖畫、音樂等各科教學之中。

### 1. 興起階段(清末—1915年)

國恥教育大約發端於清朝末年。其標誌之一，是出現了專門的社團——成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的知恥學會。梁啟超為之撰寫的《知恥學會序》稱，外患日逼，民貴知恥，“特標此義，立會以號召天下。”<sup>[2]</sup>隨後，類似的國恥教育社團相繼建立，編印出一批宣傳國恥教育的書刊，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sup>[3]</sup>。這一思潮，很快就在學校教育中產生了回應，其具體表現在：

一方面，通過新學制的實施，國恥教育開始進入中小學歷史課堂。1903年，丁寶書編撰《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明確地提出了學習歷史的目的在於“衛種族，長國威”，“長學識，雪國恥”<sup>[4]</sup>。1904年頒佈的《奏定中學堂章程》規定，學習本國歷史，“宜略授黃帝開國之功績，歷代偉人之言行，亞東文化之淵源，民國之建設，與近百年來中外之關係”，以達到“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的目的<sup>[5]</sup>。尤其是“近百年來中外之關係”，其重點自然在於介紹列強侵略中國之事實及影響。該章程將這段國恥史列為歷史教學的主要內容，通過課堂教學，達到激發學生愛國心的目的。這一設想後來也為民國初期的歷史課程標準所沿用。

另一方面，出版了專門的教科書。針對當時學校“歷史教科無善本外交史”的現狀，陳崎於1903年著成《外患史》一書，將近代中國“一敗於英、再敗於英法、三敗於法、四敗於日、五敗於八國聯軍”的屈辱歷史分交通、貿易、戰爭等方面分別記述。他強調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述吾國外交之失敗，採集日本各書加以按斷，以激發國民之志氣。”<sup>[6]</sup>這大概是我們今天見到的最早的關於國恥教育的教科書。

國恥教育興起於近代中國不是偶然的，它是民族危機的產物。整個近代中國，救亡圖存是時代的主題。“滅亡人國，必先去其史”，歷史是一個民族的記憶，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如果沒有對民族歷史的集體記憶，就等於沒有了民族的精神長城。因此，“罄竹難書的國恥，吾人正好拿來喚醒一

般後起的民衆，預先培養與強權奮鬥的實力”<sup>[7]</sup>。

## 2. 發展階段(1915—1927)

1915年5月9日，“二十一條”的簽訂帶給中華民族更深重的災難。國人將這一天作為國恥日，強調“此國恥二字不容不灌輸於人人之腦中也”<sup>[8]</sup>。於是，“國恥”一詞屢屢出現在中國各級學校的課堂上，學校國恥教育由此進入較快發展階段。

1925年中華教育改進社第四屆年會，教育行政組於擬修訂的教育宗旨中列有“酌施國恥教育，以培植愛國感情”一條，初等教育組有施行國恥教育一案<sup>[9]</sup>。同年10月，第十一屆全國省教育會聯合會通過《今後教育宜注意民族主義案》，特別提到編寫歷史教科書“應多取吾國民族光榮之歷史，及說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兒童教育“多採用國恥圖畫、國恥故事，以引起其愛國愛家愛種族之觀念”。<sup>[10]</sup>至於國恥教育的目的，當時的學者也進行了更理性的剖析，一方面強調“要國民在受人家拳打腳踢的時候要知道痛癢”<sup>[11]</sup>，另一方面強調在於促進“民族自省”和爭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而不在於對外國人的報復<sup>[12]</sup>。

受當時形勢的影響，這一階段的學校國恥教育，不同於清末籠統地提倡反對列強侵略，而是開始將主要矛頭指向日本帝國主義。國恥教育實施的方式，主要有教科書編寫、國恥紀念集會、演講以及課堂講授等。

該階段學校國恥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因為30年代作為中國抗日救亡運動中堅的知識階層，大多是這個階段接受教育的中小學生。

## 3. 高漲階段(1928—1937)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恥教育通過國家教育體制，貫徹於學校的各項活動和各科教學中，更為深刻地影響著廣大中小學生。

1928年5月15日，中華民國大學院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朱家驊等人提交《中小學應特別注意國恥教材以喚起民族觀念案》，指出“我國疊受外侮，民氣日弱，欲強國保種，須喚起國民同仇敵愾。”其具體措施有：國恥教育充分編入中小學教科書、學校遇有機會即宣傳國恥事實、國恥圖書必須準備；師生共同研究打倒第一仇國的方案。<sup>[13]</sup>而在這次會議之前，日軍剛剛製造了著名的濟南事件，可以說，中日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直接推動了此項有關“國恥教育”議案的提出並在大會中獲得通過。

與此同時，國民黨及其決策人物蔣介石也明確提出要將國恥教育作為救亡圖存的重要手段。蔣介石在致蔡元培的電報中說：“國家危亡，至此已極。挽救之道，非從興學養廉，激濁揚清入手，另無他法。……尤須注重小學教科書與小學老師，必使其有愛國雪恥之血心，而後方能任其為老師也。教科書之精神，其一即為國恥，而尤須注重膠東與遼東之恥辱；其次乃為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再次則為本黨之歷史與國民革命之意義。”<sup>[14]</sup>他強調有“愛國雪恥之血心”的人方能任小學老師，並認為國恥是小學教科書的核心，其重要性甚至還在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之上。

此後，學校國恥教育進入一個新階段：其一，由過去教育界自發的國恥教育，一改而為由政府直接指令執行的學校國恥教育。如1932年6月教育部頒佈了《今後中小學訓育上應特別注重之事項》，通令要求全國中小學應充分利用教學機會，增強學生對於雪恥救國的系統觀念。其二，學校實施國恥教育貫穿於學校各項教育管理活動之中，形式多種多樣。除了各科教學的主渠道外，在學校環境設備上“配置國恥地圖、國恥歷史表解、國難中所受損失統計圖表、國難發生地方前後比較詳圖、中國民族運動史事圖、各地義勇軍抗敵圖以及記載中日交涉的圖書資料和其他國難資料”<sup>[15]</sup>，並利用各種集會、紀念會，加強重要時事的報告，集體高呼“誓雪中國國恥，恢復中國領土”等口號；

全國高中以上學校組織的義勇軍，要佩戴“團結奮勇，雪恥救國”八字符號，並在課餘時間組織宣傳隊，努力於喚起民衆的工作<sup>[16]</sup>。

抗戰爆發後，在抗戰建國口號下，中國教育學會第三屆年會決定組成非常時期教育研究會，討論非常時期的“國恥教育”<sup>[17]</sup>，國恥教育逐漸成爲國難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

## 二、學校國恥教育的教材

### 1. 國恥教育教材的種類

隨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廣大愛國學人緊扣時代脈搏，將學術研究的“求真”與“致用”相結合，參與編寫了一批國恥教育書籍和教科書，直接投身於國恥教育之中。

#### (1) 國恥教育書刊

在學校教育中，這類書刊主要是教師參考用書，也有少量是專爲學生編寫的輔助讀物。

我們查閱《民國時期總書目》，發現以“國恥”命名的書籍，僅在“中國國恥史”目下就列有 35 種<sup>[18]</sup>，尚未包括其他專題欄下的國恥書籍。這些國恥類書籍，從內容上大致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國恥史，從鴉片戰爭開始，按時間先後撰寫歷次國恥事件的經過和危害，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沈文浚著《國恥小史》(1910 年)、趙玉森編《國恥小史繼編》(1915 年中國圖書公司)、呂思勉編著《國恥小史》(1917 年)和郭汝成著《國恥史綱要》(1936 年)<sup>[19]</sup>；另一類是國恥演講文集，如蔡元培等人的《國恥演講集》(1933 年上海申報館出版)。此外，民國時期，中華書局曾出版過一套常識叢書，稱“中人以上學生及各科專家必備的參考書”，包括有朱壽因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小史》(1924)、謝彬編《中國喪地史》(1925 年)等。其中謝彬編《中國喪地史》在“編輯大意”中強調，該書“應國情時事之需要而編輯”，“歷述我國自清乾嘉以來喪失領土、領海兩權之重大事實”，“意在促進讀者之愛國思想”。

各種期刊具有流通廣、出版迅速的特點。民國時期出現了一些以國恥命名的專門刊物或專號，前者如 1921 年無錫國恥編譯社出版的《國恥雜誌》<sup>[20]</sup>等，後者如 1931 年《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 2 卷第 36 期“國恥紀念專號”等。“國恥紀念專號”特別選在 5 月 9 日國恥紀念日出版。

#### (2) 學生用教科書

教科書是各學科基本知識的載體，是教師進行教學的基本依據，也是學生獲得系統知識的主要工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民間出版機構紛紛依據新修訂的課程標準，推出以弘揚民族精神爲主旨的教材，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復興小學教科書，中華書局出版的新小學教科書，世界書局的新標準小學教科書，開明書局的開明小學教科書，大東書局出版的新生活小學教科書，等等。當時人評價說，這些是“把民族精神做骨幹，特別注重救國雪恥的教材。”<sup>[21]</sup>

這一時期，爲了配合國恥教育，學校還陸續編寫了一些頗具時代特色的革命紀念日類教材，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由浙江一中小學部全體教員實驗和修正、由徐則敏執筆編寫的《實驗小學紀念日教材》<sup>[22]</sup>。該教材的編寫緣起，是回應 1926 年蘇、浙、皖三省附小聯合會在杭州開會時所作出的利用各種紀念日以增進國恥教育的倡議。該教材將散見於報章雜誌的有關材料精選後，按紀念日的先後順序分別編寫，非常便於師生的使用。例如，以五月爲例，所列的紀念日包括：五月四日——五四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意義、五月九日——五九國恥和我國的國恥、五月三十日——五卅慘案和怎樣復仇等。該教材還附各紀念日歌譜，如《二十一條》歌詞云：“上古到如今，堂堂大國民；二十一條件，國威失乾淨；人生最羞恥，要算亡國民；中華好男兒，雪恥要同心。”

### 2. 國恥事件的選取

弘揚民族文化，激勵民族精神，歷史教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26 年，著名教育家余家菊就

曾指出：“歷史科示人以本國盛衰之迹、文化進展之由，或使人起保護之心或使人起雪恥之念，其用多端。……如八十年來海禁大啓，割地喪權，蔑有寧日，又皆國民奇恥而為歷史科所應教以洗雪者也。”<sup>[23]</sup>

選擇哪些國恥事件來進行教育，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國恥教育的實際效果。為此，徐映川列出了確定國恥教育素材的四項標準：(1)關係重大搖動本國的；(2)事後使國內大勢起絕大變化的；(3)直接間接使國民受害很長久的；(4)民族的弱點很顯著的。以此為標準，他對1925年時發行的八種歷史教科書中所選的國恥事件進行了統計<sup>[24]</sup>。我們將1929年頒佈的《初級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的教材大綱中規定的國恥內容與之進行了對比，列表如下：

1929年《初級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規定的國恥內容	徐映川統計的國恥事件名稱(括弧內為在8種課本中收有該事件的課本數)
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	中英交涉鴉片戰爭(8)緬甸(3)
英法聯軍之役與俄國的侵地	英法聯軍(4)中俄交涉吉黑邊境(4)伊犁(3)
中法之戰與南方藩屬的喪失	中法交涉安南(8)
中日之戰與中俄交涉	中日交涉朝鮮臺灣(8)山東問題(7)五九條約(7)日俄戰爭(4)
沿海港灣的租借	各國租借港口(4)
戊戌政變與八國聯軍之役	義和團(8)
日俄戰後的列強與中國的關係	
民國十五年來的內政外交	
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與最近外交	

通過這個列表，我們可以發現，1925年時編寫發行的歷史教科書中，重大的國恥事件多已編入其中且有詳細的論述。而1929年頒佈的《初級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對前者有很好的繼承，並在其基礎上補入了最近的國恥事件，使歷史教材中的國恥事件更為豐富。同年，國民政府開始實行教科書審查制度，規定只有經過教育部審查的教科書才能出版和發行，這就為上述國恥史料在歷史教材中的充分體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 3. 國恥教育滲透各科教學

如前所述，國恥教育不僅僅是歷史課的職責，而應貫穿於學校各科教學之中。1926年，許多有識之士在致力於愛國教材的編寫時就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中華教育界》在1926年第16卷第1期推出了小學愛國教材專號，分別論述國語科、公民科、歷史科、地理科、社會科、算術科、圖畫科的愛國教材，對各科如何進行國恥教育進行了詳細的論證，例如：

國語科選編國恥教材，可以通過童話、故事、寓言、小說、劇本、童謠、詩歌、說明文、傳記文、議論文等不同的體裁編入國恥教育的內容。

“史地不分家”，梁啟超說：“讀史不明地理則空間概念不確定，譬諸築屋而拔其礎也。”<sup>[25]</sup>忽視空間概念，將直接影響到對國恥事實的理解。黃競白提出，如講國都，要注意英法聯軍入京竊取寶物、焚毀圓明園、《辛丑條約》允許八國駐軍東交民巷；講到國家的三大收入——田賦、關稅、鹽稅，則要注意關稅、鹽稅不能自由的原因和所受的影響；講海外僑民的勢力，要注意僑民的耐苦經營以及受白人的虐待，等等<sup>[26]</sup>。

算術科，俞子夷指出，“大概關於歷來國恥方面的事，像割地、賠款和近時外交上的損失，凡是可

以用數量計算的，只要學生能力夠得到，都應該詳細地計算。<sup>[27]</sup>

至於圖畫科和音樂科，主要是通過所畫或所表現的物件來滲透國恥教育，如國恥故事畫、國慶及國恥紀念畫、愛國及賣國者的肖像、本國名勝古迹、國恥地圖等。其中地圖類，就應包括“國土全圖——注意國界——租界圖，本國軍隊分佈圖、歷來喪失地總圖及商埠軍港”<sup>[28]</sup>。

1936年2月18日，教育部公佈《修正中小學教學科目及課時數》，指出改進中小學教學要“注重民族意識”，“修訂充實初高中各科課程標準，于公民、國文、史地等科添增關於民族精神之教材”<sup>[29]</sup>。從而進一步強調了學校各科教學中貫徹國恥教育的必要性。

統觀民國成立至1937年間的學校國恥教育教材，可以看出有幾個非常突出的特點：一、教材覆蓋中小學，使學生從小養成愛國心和民族意識；二、題材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近代中國所遭受的重大侵略，尤其是日本侵華歷史與現狀的各個方面；三、表現形式豐富多樣，國恥教育滲透於各科教材、教學；四、同一題材，各科多不重複，將不同的重點巧妙地組合。

### 三、國恥教育教案分析

學校國恥教育在教學中的一個重要體現，是教師們專門設計的一批教學案例。雖然有的稱“教學大綱”，有的稱“教材”，但其格式與我們今天通用的教案大致相同。分析具體的教案，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從微觀層面認識學校國恥教育實施的特點。

1932年，《浙江教育行政周刊》雜誌的編輯者有感於“自國難發生以來，學校教師無不認為教學方面應側重於時事，以引起學生自動研究日本問題，共謀抗日救國之有效方法為當今要務”，特別將趙企預設計的《幼稚園和低年級東北事件教學大綱》和《小學中高年級東北事件教學大綱》刊登出來<sup>[30]</sup>，以便於教師們參考和研究。趙企預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教育科，時任上海市立其美小學校長，既有較深厚的教育理論功底，又有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因而設計的教案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較強的操作性。下面所引用的資料均來源於這兩個教案。

#### 1. 目的明確，因材施教

在這兩個教案中，趙企預分別設計了以下的教學目標：

《幼稚園和低年級東北事件》教學目標	《小學中高年級東北事件》教學目標
1. 使兒童明瞭東北事件	事件之真相及起因
2. 使兒童知道我國之東北	東北之現狀
3. 使兒童知道日本是我國的仇敵	略知日本之現狀；明瞭日本帝國主義；我國與日本之關係
4. 使兒童知道怎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抗日救國之方策

從上表可以看到，一方面，這兩個教案設計的目的都非常明確，就是通過具體的教學活動，實施國恥教育。它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在瞭解歷史事件的基礎上，思考中日兩國的關係，最後落實到具體的救國方案。

另一方面，突出體現了因材施教的原則。其考慮到幼稚園與低年級、小學中高年級學生在年齡、知識、心理等方面的差異，設計了不同的目標層次，是較為科學和合理的。不僅如此，其設計具體的研究內容時，也處處注意分別標注其適用的年齡段，以便於提高教學的效果。

當然，這兩個教學目標的設計還存在某些不足。當今教學目標一般分為知識與過程、情感態度價值觀和能力培養等三方面，將今天的標準與以上兩個教案所設計的目標對照來看，可以發現它們

只是注重知識層面的目標，而沒有體現情感態度價值觀和能力培養方面的目標。儘管我們從其研究過程可以推測實際的效果中是包含有後兩者的，但沒有明確寫到教學目標中，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 2. 緊扣時事，學以致用

注意歷史與現實的聯繫，緊扣時事設計教學，是近代中國中小學教學的一個很好的傳統。民國時南京蘇師四小的周翕庭教員就曾指出，該校“常因研究時事，而將一學期預定的教材移前或移後教學，以研究時事做研究史地預定教材的動機”<sup>[31]</sup>。從上述這兩個案例可看出，它們基本不按教科書的進度照本宣科，而是從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時事獲取學習材料，注重教學與學生生活的緊密聯繫，強調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學校國恥教育的目的，是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為救國、強國的現實需要服務。因此，在這兩個教案中，趙企預均強調，“怎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小學生的救國方法”是“本事件教學的終了目的”。無論是幼稚園與低年級，還是中高年級的案例，我們都看到其最後一部分“怎樣打倒帝國主義”並不是簡單地表決心，而是開列了一些非常具體的行動計劃，如：“我們要用功讀書鍛煉身體；我們要自己會造好東西、我們要練好軍隊、我們要不買日貨、我們要不幫日本人做事；我們要聯絡世界上弱小的被壓迫的民族。”儘管這些計劃擬定得並不完善，但我們還是可以從這深切體會到當時學校國恥教育中對學以致用的一種追求。

### 3. 各科滲透，靈活多樣

這一特點在趙企預設計的中高年級的案例中體現得尤為突出，我們將其重要內容精選入下表：

科目	內容
黨義	帝國主義、什麼是日本帝國主義
社會	事件本體之研究；東北研究、日本研究、日本與我國之關係、東北事件之遠因近果、抗救方案
自然	物產方面：(略)理化方面：槍彈火器之製造；軍用器械之研究
國語	讀：東北槍聲、被壓迫者的呼聲等 看：韓國痛史、日本侵佔東北真相畫書、可敬仰的國人(日報剪貼) 演說表演：東北的重要、不買日貨、為國犧牲、最後一課等 寫作：擬書稿警告日本政府、上國民政府書、標語、對聯等
算術	事件損失方面的計算：建築物的損失、工商業、軍火、軍民的死亡等
美術	寫實畫：攻打瀋陽城、梁營長昏夜苦戰、民衆請願等
音樂	國恥歌、義勇軍歌等

以上各科的內容，與上文所述愛國教材的設想大致一樣。但當它們具體地出現在同一個案例中時，還是給我們很大的衝擊力。該教案注意了各科國恥教材的相互配合，並且從研究、閱讀、寫作、表演、繪畫、演唱等方面設計學生的活動，更有助於學生在實踐中加深理解國恥事件，激發愛國熱情。正如當時人所強調的：“充分給兒童以動作的機會，使兒童由實踐中養成愛國熱忱。不然，讀熟滿肚子的愛國教材，還是沒用的。”<sup>[32]</sup>

這些生動的案例，反映了基層教育工作者們將救國與自己的本職工作相結合、將歷史教育功能的發揮與具體的教學實踐相結合的種種努力。因此，對於當時進行國恥教育的主要群體——歷史教師，歷史學家陳訓慈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賴他們的忠貞辛勞，在民族戰線的後方盡力，使全國數

千萬的青年，能對於民族的演進與光榮，有深切的認識，方能激發其強烈的民族意識，以知盡他們對民族應負的責任。這樣普遍的認識與信息，正是我們民族生存復興的基石。”<sup>[33]</sup>

自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世紀內，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凌、蹂躪，所受的苦難舉世罕見。從國情和時代需要出發，民國時期興起的學校國恥教育，在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方面發揮了非常巨大的積極影響。朱仲玉先生曾回憶自己三十年代中期在紹興中學附中上高小時的情景說：“記得每年五月，隔幾天就要開一次國恥紀念會。會上教師在臺上聲淚俱下地講歷史事件的經過，學生在台下一邊靜聽，一邊歎歎抽泣。這樣，一些中國近代知識就深深地印在腦海中了。”<sup>[34]</sup>

那麼，在中華民族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半個多世紀之後，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是否還有必要對青少年學生進行國恥教育呢？答案是肯定的！長期研究殖民地教育史的齊紅深研究員指出：“由於國難、國恥教育不夠，一些未成年人對當年日寇侵略的本質產生疑問，甚至有人錯誤地認為如果日本不被打跑，東北今天可能更富裕更開放。”<sup>[35]</sup>國恥教育不應隨著中華民族的日益強大而被遺忘和拋棄。當然，我們在強調國恥教育必要性的同時，還要注意克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不正當的國家觀念。在民國時期學校國恥教育高漲的風潮之中，一些有識之士已經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例如，徐映川對不少兒童瞭解國恥之後發表的諸如“我殺掉你這個小鬼”、“狼心狗肺的……”等看法深表憂慮<sup>[36]</sup>。近代著名教育家俞子夷亦告誡說：“培養愛國觀念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挑撥些排外的感情便可以了事。這種輕浮的拳匪式的愛國，或者反要在將來發生不良影響”、“真正的愛國思想，是要建設在豐富而活躍的知識，同情和公正的判斷，堅強而有理性的意志上的。”<sup>[37]</sup>我們今天更應該以理性的態度來認識國恥與國恥教育。

總之，民國時期中小學校廣泛開展的國恥教育，是民國教育史上頗為重要且極具特色的一種教育現象。國恥教育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對於當代教育，尤其是當代歷史教育，也有重要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 註釋：

- [1]《辭海》(中冊)，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65 頁。
- [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知恥學會敘》，中華書局 1936 年版，文集第二冊第 68 頁。
- [3]如黃毅、方夢超：《中國最近恥辱記》，上海國恥社 1915 年出版；上海知恥社編：《國恥》1915 年出版；孫鑫源：《國恥鑒》，上海文明書局 1915 年版。
- [4]丁寶書編：《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文明書局 1903 年版，編輯大意。
- [5]參見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彙編》(歷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頁。
- [6]陳崎：《外患史》，時中書局 1903 年版，敘。
- [7]益三：《有關國恥的史地教材應否酌量編入教本以激勵民氣》，《中華教育界》第 16 卷第 12 期，1926 年。
- [8]侯鴻鑒：《改訂教科書之臆測說》，《中華教育界》第 4 卷第 8 期，1915 年。
- [9]徐映川：《小學史地教本中國恥教材問題》，《中華教育界》第 15 卷第 6 期，1925 年。
- [10]《第十一屆全國教聯會議決要案全文》，《中華教育界》第 16 卷第 1 期，1926 年。
- [11]彭家煌：《論國家主義的教育》，《教育雜誌》第 17 卷第 8 號，1927 年。
- [12]常道直：《小學史地科中之國恥事實》，《教育雜誌》第 15 卷第 10 號，1925 年。
- [13]《中小學應特別注意國恥教材以喚起民族觀念案》，參見《中國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80 頁。

[14]《蔣介石致蔡元培電》，引自李國祁：《北伐的政略》，載《北伐統一60年學術講義集》，（臺北）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1988年印行，第233頁。轉引自齊紅深主編：《日本侵華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頁。

[15]《今後中小學訓育上應特別注重之事項》，載《中國教育事典》（初等教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607頁。

[16]《教育部頒發學生、童子軍、義勇軍教育和訓練的有關文件》，載《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教育（二），第1267—126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轉引自齊紅深主編：《日本侵華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頁。

[17]《主要學術團體集會紀要》，《教育雜誌》第26卷第4期，1934年。國難教育與國恥教育大致相同。在外敵入侵，中國政局動蕩之時，學校國恥教育更為迫切和複雜，除了一部分沿用1937年以前的做法以外，又增加了許多新的舉措，擬另文敘述。

[18]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歷史傳記考古地理（上），“帝國主義侵華史”一欄共有88種書籍，該欄下包括“中國國恥史”目，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172頁。

[19]沈文浚：《國恥小史》，中國圖書公司1910年版；趙玉森編《國恥小史繼編》，中國圖書公司1915年版；呂思勉編著《國恥小史》，中華書局1917年版；郭汝成著《國恥史綱要》，中華書局1936年版。

[20]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編輯組編：《1833—1949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增訂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年版，第784頁。

[21]吳研因：《清末以來我國小學教科書概觀》，《中華教育界》，第23卷第11期，1936年5月。

[22]徐則敏：《編輯紀念日教材芻議》、《實驗小學紀念日教材》，《中華教育界》第16卷第5期，1926年。

[23]余家菊：《愛國教材在小學教育中的地位》，《中華教育界》第16卷第1期，1926年。

[24]徐映川：《小學史地教本中國恥教材問題》，《中華教育界》第15卷第6期，1925年。其所閱八種教科書在文中只是列出書名和出版年代，其中三本今天能查出確切作者和出版機構：《歷史課本》（金兆梓編：《新小學教科書歷史課本》，上海中華書局1923年版）、《高小新法歷史教科書》（1920年）、《新教育歷史教科書》（1921年）、《後期新法歷史教科書》（傅運森編著：《新法歷史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新撰歷史教科書》（1924年）、《歷史讀本》（1924年）、《白話中國歷史》（冰壺主人編述：《注釋白話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會文堂書局1923年版）。

[25]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國地理沿革圖序》，中華書局1936年版，文集第十三冊第25頁。

[26]黃競白：《小學地理科應有的愛國教材》，《中華教育界》第16卷第1期，1926年。

[27]俞子夷：《小學算術科應有的愛國教材》，《中華教育界》第16卷第1期，1926年。

[28]何元：《小學圖畫科應有的愛國教材》，《中華教育界》第16卷第1期，1926年。

[29]《教育部公佈修正初中小學教學科目及時數》，《教育雜誌》第26卷第4號，1934年。

[30]趙企預：《幼稚園和低年級東北事件教學大綱》、《小學中高年級東北事件教學大綱》，《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3卷第9、10號，1932年。其他類似的案例還有潘毓才：《小學社會科採用大單元編制的教材：日本的研究》、浙江省立六中附小：《抗日救國教材舉例：日本出兵侵略東三省的原因》，同上刊第9、12號；盛朗西、孫慕堅：《上中實小低/中年級日本研究教學大綱》，《中華教育界》第17卷第12期，1927年等。

[31]周翕庭：《道爾頓制下史地科中愛國教材的時事教學和預定教材的聯絡》，《中華教育界》第16卷第1期，1926年。

- [32]胡叔異:《小學公民科應有的愛國教材》,《中華教育界》第16卷第1期,1926年。
- [33]陳訓慈:《民族名人傳記與歷史教材》,《教與學》第1卷第4期,1935年。
- [34]朱仲玉:《漫話各級學校歷史課程的設置》,《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1期。
- [35]轉引自魏運亨:《強化國恥國難研究和教育》,《瞭望》第37期,2004年9月13日。
- [36]徐映川:《小學史地教本中國恥教材問題》,《中華教育界》第15卷第6期,1925年。
- [37]俞子夷:《小學算學科裏的愛國教材》,《中華教育界》第16卷第1期,1926年。